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实践中的创新性发展

孙利天

自 40 年前“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推动社会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的同时，不断推进自身的思想解放和哲学观念变革，以丰硕的哲学理论创新成果，实际地参与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实践的理論，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密切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自觉回应和满足实践的理论需要，实现了理论研究逻辑与实践发展逻辑的高度统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路线基础。随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认识论范式、实践哲学范式、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这些不同理解的共同点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民的理论的人民主体性思想，确立了人民作为认识主体、价值主体、实践主体和历史主体的地位，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各种西方思潮和西方学术思想涌入我国，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思想开放、沉稳应对，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和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哲学中的竞争力和在世界观、方法论层面的引领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理论日益得到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和思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努力把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问题转化、提升为哲学中的问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特别是在我们逐渐获得和增强的文化自信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自觉地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增大，一个改革、开放和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理解和对待全球化的世界？如何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资本论》的时代判断，回应“历史终结论”和西方政治哲学“全球正义”等理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了大量的理论论证。总之，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硕果累累，基于此，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试

作粗浅概括，进行回顾、反思和评述。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与人民主体性的理论自觉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提出的理论问题，这场讨论也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研究的理论热潮，甚至可以说出现了认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研究所以成为主题和热点，可能有多种原因促成。首先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引发和促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总是历史的、有限的实践，实践标准也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并非所有真理性的认识都需要实践检验，逻辑证明作为检验真理的辅助手段也是重要的；实践作为感性物质活动并不能直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中的主体才能判断和验证实践的检验后果；等等。真理标准的讨论必然引发学理上的深入探索。其次，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刚刚打开的国门引入了新的科学信息，自然科学的“新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苏联哲学家关于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研究，如柯普宁和凯德洛夫等人的著作的译介，以及稍后的西方科学哲学的译介，共同为认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促进了认识论研究的深化。最后，就是对苏联模式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批判性反思，人们觉得这一教科书更多地继承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而缺少康德认识论转向之后的理论高度。所以，人们认为它是“前康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

20世纪80年代的认识论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比如，吸取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和哲学思想，人们提出用选择论、建构论批判消极被动的反映论；利用自然科学、心理学以及后来的认知科学或思维科学成果建立微观认识论的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对认识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理解，建立社会认识论；概括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创建新的具有认识论范畴意义的新概念，为自然科学发展提供科学认识论；乃至从列宁《哲学笔记》中“辩证法就是认识论”^①的理解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继而按照认识论的体系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认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这是具有鲜明科学精神的研究范式。它不仅努力吸取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而且力求为自然科学提供科学认识论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认识、科学知识的科学态度，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性和专业性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认识论研究范式的鲜明的主体性精神。上述认识论研究的多种努力，共同指向认识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①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8页。

的奥秘，这也是全部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力求破解的奥秘。认识何以可能，内在的意识如何切中外部的实在，这些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动反映论的“能动的”结构、内涵、规律和原理的研究，从而使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先验的意识机能等得到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论探索。

在认识论的研究范式中，人们发现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也是价值的主体，哲学不仅是真理的追求，也是价值的追求。哲学是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由此，开启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哲学研究。从价值哲学的研究视角审视问题，必然触及人本身的价值问题，人民主体不仅是一切价值判断的主体，其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价值哲学研究以其特有的现实性、人民性直接触及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一方面它深刻反思“文革”十年浩劫的价值偏失，另一方面它引导人们去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改革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研究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和构建，积极展开与现代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对话，在“普世价值”、“全球正义”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占据着价值上、道义上的制高点。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范式日渐式微，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实现了“实践哲学”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学者从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相互关系的研究中，确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再后来，也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意义是用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新世界观，而不是以历史为对象的唯物主义。这些影响很大的观点可以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转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逻辑说，实践哲学范式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是对认识论研究范式的深化和变革，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质的新理解和新论断，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深化的文献研究和专业研究的理论进展。而从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说，则是社会主义改革中人民主体地位的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从 90 年代我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这场全党全国人民新的伟大历史实践从何处获得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如何破解旧体制的障碍和旧观念的束缚？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确立科学发展观？这些重大的现实实践问题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思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和依据，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束缚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体制机制障碍，使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在自由平等的交换中得到全面释放和发展。有学者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呼唤的主体性内涵。

回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我们从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民的理论”的日益自觉。哲学以思辨的理论形式，确立了人民作为认识主体、价值主体、实践主体和历史主体的地位，我们似乎可以说，认识论范式、实践哲学范式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以科学理论的形式论证了人民主体的真理制高点，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和持续多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则唤醒和确立了人民主体的价值的、道义的制高点。这两者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

二、实践哲学范式对“实践的理论”的自觉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40年的另一重大收获，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理论”达到高度自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实践理论的深入探索。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基础、认识发展的动力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人们所熟知的。学界进而思考，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否也是其根本性质，是否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贯彻于世界观、历史观、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全部领域，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伊始，中国美学界从毛泽东论“形象思维”的大讨论开始，逐渐形成了“实践美学”的主流思潮，进而扩展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提出了实践本体论的理论。实践作为人的感性物质活动，不仅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对入显现的自然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自然存在只有进入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的视野才具有属人的意义。因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了本体论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哲学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是“实践的理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宣称“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目标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功能以及理论性质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但由于我们多年一直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如何从理论形态上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并且能够兼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探索。特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充分吸取了实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5页。

唯物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对实践作为感性物质活动的物质性和客观性与物质的客观性潜含的实践的能动性的统一，作出了深入的论证，从根本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论高度。

与实践本体论和实践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不同，20 世纪 80 年代末吉林大学高清海先生提出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理解，进一步推进了“实践范式”的转换。这种理解强调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由此，才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性质和理论形态的全部革命。实践是主体和客体否定性统一关系：实践要否定客体的自在性，改变自然物的存在形态使之满足人的需要；实践也要否定人的不切实际的主观任性，使人的主观目的和意志具有客观现实性。在相互否定的主客历史的统一性中，生成着人的自身发展和人的世界。以这种实践观点去理解世界和人本身以及以往全部旧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全新的实践的理论。这种实践的理论终结了理论哲学必然具有的本体论化思维方式，也就是追本溯源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理论哲学若成为一种自足自洽的理论体系，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确定的、不可怀疑的理论支点，也就是要找到一个似乎具有自明性的本体或本原，以此建立理论体系的起点。这种还原论或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作为对自然的科学认识是必要的，但却无法理解实践中的现实的人本身，也无法理解实践中世界的历史性生成。按照“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人是在社会性的实践中获得自身的本质规定，而不能用遗传基因解释人的社会性本质；世界也不是永恒不变的直观给予的世界，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变化的属人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提出和论证，始终是在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历史演变的逻辑中展开的，该观点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维方式是现代西方哲学的起点。整个 20 世纪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消解实体本体论的思想潮流，是与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的。这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展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共享的思维方式的平台。

在后来对实践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中，有学者更加自觉地梳理实践范式的精细区分及其不同的理论意义，更加深刻地提出哲学理论内在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理论，是以实践为理解的视角或地平线的理论，理论源于实践，理论从属于实践，实践需要展开了理论想象和理论思考的视域和空间，从而终结了独立的、自足的理论哲学。在实践哲学范式的理论思考中，实践的优先性和实践的理论的自觉，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广泛开展各种部门哲学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所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生态哲学和发展哲学等部门哲学中，都得到了全面的关注和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资源和背景的部门哲学研究，不仅关注改革开放中社会各领域的具体实践和问题，而且力求从不同领域的哲学研究中升华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形成了多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理解。比如,按照卡西尔的思路,人是符号化的动物,符号化形成的不同文化扇面就是人的文化世界,从而文化哲学研究就是人的哲学研究。同样,也可以说人是政治动物,政治作为全部人类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正义性,就是当代哲学的核心。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中心任务和时代主题,经济哲学和发展哲学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的许多研究成果为确立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科学发展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出了理论贡献。

三、在现代性的境遇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它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当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不断深入和改革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日益具有现代性的特质。西方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的规定和反思及其所揭示的现代性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真实地成为我们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工具理性的强化和价值理性的弱化;自反性的现代化造成的风险社会;现代性导致的自我认同的问题;现代化造成的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面对和解答的新的时代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各种现代西方思潮相继进入国内。这些理论和思潮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一方面包含着解释和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又有其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局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以“洋为中用”的辩证态度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因素,从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和时代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思潮中,有许多理论直接或间接地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几乎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基本原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作出认真的理论回应和充分的理论反驳,唯此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对我国影响较大的理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哲学,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多方面的批判和挑战。比如,波普尔说辩证法理论是不可证伪的,因而是非科学的;哈耶克批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是理性的自负,必将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等等。我国学者对此都有理论的回应和反驳。从根本点说,新自由主义哲学仍是经验科学的思维方式或知性思维方式。辩证法不是具体的经验科学方法,它不是在经验科学的视域中作出具体的经验发现和科学预测,因而也不能用经验的方法证实或证伪。辩证法作为哲学的思维方式,只能在大尺度的历史过程和奎因所说的整体性经验中得到检验。至于哈耶克和波普尔对社会主义的理性信念和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也再次表明用经验科学的知性思维

方式只能误解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追求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理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很高的效率和合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在涉及人的理性信念方面，新自由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乃至后马克思主义等具有一致性，它们在批判传统哲学的绝对主义、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时，失去了普遍理性的信念，胡塞尔认为这是欧洲科学危机的实质。后现代主义哲学批评马克思主义宏大的解放叙事，后形而上学思想把普遍理性转化为具体的实践理性、交往理性，后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战略而关注微观的激进政治的反抗。问题的关键是，在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绝对主义同一性哲学的桎梏后，所谓后形而上学是否还有形而上学的追求和思想维度，没有了绝对理性是否仍需保留普遍的理性主义信念。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实践哲学转向之后，终结了独立的、自足的理论哲学，但仍保留了实践视域中理论哲学和无限理性信念的追求，唯此，才能有对世界的理性的、整体性的哲学理解，才能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理想。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要直接回应和反驳现代西方哲学的批评和挑战，还要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理论的对话和竞争中吸取其有益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40 年的历史进程中，各种现代西方哲学理论竞相登场，可能已少有遗漏。如果检索一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论文，几乎所有在西方有一定影响的哲学家都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的研究生加以专题讨论。与西方哲学专业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学位论文在讨论现代西方哲学家时，多少都要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论，这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在不同视域和论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分析哲学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更为精细的论证方式和说话方式；现象学和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给我们带来了面向事情本身和本质直观的现象学方法；存在哲学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使我们更加关注人的自由选择和生存论的优先地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帮助我们深入反思现代性的弊端及其超越路径；后形而上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现代意义，警惕绝对主义的思想独断和形而上学同一性的思想恐怖；后马克思主义使我们看到微观政治和生活政治的意义；当代欧洲左翼对金融资本、技术统治的批判，对否定的辩证法和事件本体论的阐发，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等等。总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开放的现代语境中，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正确的思想方向，另一方面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和论争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身，从而为回答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按照我国学者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早、最深刻地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即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特质作出准确的判

断和预言,诸如现代性的工业化、城市化、祛魅化、世俗化和资本的全球化等,马克思、恩格斯已有生动具体的揭示。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入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唯一出路。因而,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解决了当下的所谓现代性问题。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在现实上必然遇到现代性问题的困扰。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中内在超越并消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了许多有益探索,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经济理性、工具理性的扩张,从而不同程度上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偏失,对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研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为确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价值观念的迅速变革,也带来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自我认同的问题,出现“本体的安全和存在性焦虑”。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我是谁?哪里是我的社会位置?从何处获得自我同一性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这种普遍的社会性焦虑需要哲学的解答。我们认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40年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积极介入和引导社会思潮,用发展的理论引导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参与构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有力地支持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按照贝克等社会学家的看法,现代化具有自反性,人类可能毁灭于自己的成功。现实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和异化问题,也使人们意识到风险社会的来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积极参与和引导生态哲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为我们党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可以肯定,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和疑难所作出的理论回应,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鲜明特点,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显示出勃勃生机。

四、在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在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中,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哲学的历史大尺度把西方现代性的根源追溯到柏拉图主义哲学。他认为柏拉图主义哲学用思想规定存在,进而用思想控制存在、宰制存在,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完成了对存在者领域的分割和控制,存在成为价值,技术集置成为催逼人为其忙碌的神秘力量,人遗忘了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曾希望有朝一日,古老的中国和俄国传统被唤醒,使人获得和技术的自由关系。海德格尔这种独特的哲学反思,似乎意味着现代性是西方哲学的产物,那么非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是否会有不同的现代性呢?或者说在非西方的文化民族被迫进入现代性中它是否会从自己的传统中开显出不同面貌的现代性

呢？从哲学和文化的特质思考一种非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建设肯定不够全面，甚至会有哲学和文化决定论的唯心主义之嫌。但不能否认的是各民族的不同文化传统对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肯定会有重大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必有源于各自传统文化的特色和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定有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

改革开放 40 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始终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文化的自觉和自信，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80 年代，人们意识到现代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就是文化现代化，所以，必须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批判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进而获得了更为根本的文化自信，我们意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从经验直观说，我国 40 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一代中国人所创造的。而这代中国人正是基于对家庭、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艰苦奋斗，勇于奉献，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经济奇迹也是民族文化的奇迹。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群体性、社会性的主体自我意识，从而使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家国情怀，有更强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每个人的勤奋工作都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是为了家国的幸福和发展。五千年从未断绝的优秀传统文化，造就了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稳定的文化基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传承着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中国智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切实的历史内涵。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并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狂热和文化自大。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总是在警醒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作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古为今用，才能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在理性的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中，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觉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相结合，努力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价值态度乃至某些具体概念和命题的合理意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表述更加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突出的理论热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多有立项，“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等全国性学术会议也多次以此为会议主题，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不计其数。有学术群体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造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总结概括其中的规律和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大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研究，需要细致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的微观基础，很多

学者对毛泽东、李达、艾思奇、冯契等人哲学思想的专题研究取得了扎实的成果。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的研究成果更为显著，认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创造了实践智慧的辩证法，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看家本领。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实践情境中，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准确把握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保持战略定力，这已成为我们党攻坚克难、制定战略方针的方法论基础。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研究也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相结合。这不仅需要细致地梳理和研究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具体地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哪些概念、命题和原理，而且需要从总体上理清和把握两大思想体系的会通之处，这样才会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精神和思想方向。学者们就此已作出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区别于希腊理性精神的德性精神，它源自于中国哲学对人的德性的自觉，形成了“天人合一”的道德世界观，实现人的道德能力的修养论和实践论是中国哲学和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即“以立德为根本”，“以树人为核心”。以德性精神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我们会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契合了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地改变世界的取向，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修齐治平的实践精神；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社会性理解，契合了中国传统的主体自我意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令人震撼的理论力量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少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原理为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先进的思维方式，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现代的世界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为艰巨的任务是现实研究，亦即如何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任务尤重。按照通常的看法，只有概括总结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充分发展后，才能有成熟的哲学概括，亦即只有有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才能有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如此主张的黑格尔哲学也不完全如此，哲学不仅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它也可以是报晓的高卢雄鸡，哲学可能会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更早地捕捉住时代精神和现实经验的实质和灵魂。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些知名学者已提出较为系统的研究思路。比如，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客观思想的传统，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中肯定已有许多客观性，具有结构的稳定性的黑格尔称之为“实体性的东西”，这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或者说是表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有范畴意义的东西。遵循马克思《资本论》的典范，把这些具有范畴意义的东西自觉地提升为哲学的概念，就可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法。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切实可行的思想道路。

五、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随着生态、环境、气候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日益具有更加开放的世界视野。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学者从生态哲学的视角讨论了能否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问题；高清海先生依据马克思的“类”理论，提出了他的“类”哲学思想；赵汀阳研究员在世界政治哲学的论域中提出了“天下体系”的中国式世界政治思维。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年过七旬的哈贝马斯仍然感到愤怒，他与德里达联名发表了《论欧洲的复兴》，力求从康德“永久和平”的世界想象中寻找和复兴欧洲文明的独特价值。这也引起我国学者进一步关注当代全球正义问题，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理论进入了世界政治哲学的对话。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高度重视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理论和新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这一新思想的时代内涵、实践原则、中国智慧和理念创新，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带来的生产、交往的世界化和普遍化，宣告了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资本的逐利和扩张本性，必然把各民族卷入资本逻辑的运转中，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人类解放的进程。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到来，全人类最后必将实现自由和解放。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论证了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出现了资本全球化的逻辑、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逻辑和民族解放逻辑复杂交织的世界历史格局。到 1970 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宣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① 在 1972 年 2 月 28 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中国方面声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也是在宣告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随着冷战的结束，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② 这一重要的时代判断为我国改革开

① 参见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 年。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04 页。

放提供了准确的世界历史方位，为我们争得了和平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总之，按照我国学者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首先是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学说，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的普遍的世界联系和世界交往，世界历史是人类必经的发展阶段；其次，世界历史理论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① 只有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每个人才能成为分享全部文明财富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再次，由资本主义生产推动的世界历史是充满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历史，在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后，世界历史交织着资本逻辑、民族解放逻辑和社会主义逻辑的对抗和斗争；最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主动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利用世界市场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并积极引领世界历史的走向。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理解和领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学者的研究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客观事实。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是今天世界的现实。第二，世界历史进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由于当代世界经济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引发了生态、环境、气候等全球性问题，由于世界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各国更加频繁、紧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人类的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全球性问题和全球化经济中，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景和古老的中国智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西方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谎言，意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再一次向西方表明中国和平发展和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发展的善良愿望，再一次表明在中国传统的世界政治思维中有一种智慧就是和谐共存。有学者针对“丛林法则”的隐喻，提出万物并育的“百花园”的世界政治想象。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强大起来的中国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具有的外交理念。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必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③

研究表明，同各国人民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不会是一帆风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9 页。

② 《中庸》。

③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2 页。

的。世界历史中依然强大的资本逻辑一旦认为自己受到摩擦和阻遏，就会掀起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就会抛掉他们引以为傲的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协商民主等“普世价值”，从而使数十年西方政治哲学对全球正义、公共理性、交往对话以及永久和平的理论建构，显得软弱无力。面对不断变幻的世界风云，我们党保持战略定力，从容应对，我们坚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符合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也符合几百年世界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的人类理性精神。最近有外国学者指出，民族主义不是反对全球主义，民粹主义不是反对精英主义，二者共同反对的是现实的理性主义，这说穿了二者共有的情感狂热的本质。以哲学的理性精神去思考当代世界和人类文明的走向，近年来有学者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高清海先生关于马克思“类理论”的研究和类哲学的思考，对于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的哲学意义。^①简单说，当代人类生产和交往的实践已使人类成为“类存在”，因此需要有“类意识”和“类哲学”的人类自我意识；“类哲学”不能用自然科学和知性思维方式理解“类存在”，只能用哲学人类学的生命觉悟和辩证思维，才能消除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情感狂热，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总之，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充分吸取当代世界哲学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理论成果，作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理论高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我们相信，在全体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达到新的历史高度，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牢牢占据人类文明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责任编辑：王海锋〕

^① 参见张曙光：《“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 年第 1 期。